

三十年怀想

——悼凌叔华老师

骆明

当时，嘴里不说，心里很是难过。一个老人，一只小猫，一座大而空的屋子。离开时，望着那扇门，心里有一阵凄恻。

应该是5月9日罢！那天我经过香港，又到书店去了。

在书店中，我买了好几本书，也买了一本凌叔华教授的选集——“花之寺，女人，小哥儿俩”。

买这本书的理由是，这是一本“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”，它是1986年印刷的，但是重要的它是“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”。能被选中而刊印，自有它的重要性与意义。在此之前，一共也只有17种被刊印。



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要买这部书呢？可以很肯定地说：最重大的理由因为它是我们大学老师的作品。自然觉得珍贵，自然有一种吸引力。当然，最重要的，还在于纪念，一份30年的怀念。

人的心灵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。自从买了这本书，心里很自然地

怀想到凌老师，她的样子相貌一直在眼光幌动。

想到那年在伦敦见到她的时候，背已经弯了；

想到那年在伦敦最后见到她时，只有一只不大起眼的猫儿陪伴着她；

想到那年她跟我们分别，怕不已有六十余岁，因为她是五四文学运动时期的作者；

想着从1960年自新加坡分别到现在已经30年了，怕不有90岁了。

最后想着，现在她不知怎么样了。

6月10日翻开报纸，看到南大第一届中文系同学辄凌叔华教授。

这才知道，凌老师已经逝世了。

后来才听说，南大第一届一位女同学因此赶到北京为凌老师奔丧，她最少也代表了第一届中文系同学致送了一个花圈。

原来凌老师是癌症致命；凌老师逝世的正确日期文5月22日，正好是90岁。

那一年凌教授到南大来，是教“语法”及“新文学”两门功课。

第一届的南大同学，见到一位曾经参加五四运动的作者来教我们新文学，那种轰动，那种敬佩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了。

因此“新文学”选课的人非常多，好像还有其他别系的人也来选修。

老实说，凌教授课并不教得怎样生动，但是她有许多

亲身的经历。同时，凌教授的为人诚恳、朴实、坦白，一副光风霁月，名家风范，实在令人敬服。这一点，我想许多上过她的课的同学都会承认，她没有那种投人所好，耍弄手段，或者将一本《元曲选》用纸包好，在上课时照念混日子的作法。

讲课是一种技巧，跟口才有关，同时又要能讲，也敢当演员，而且声响也要够大，才能吸引、控制全场。

这些，凌老师没有，她的音量太小，语调又不高，再加上是大班上课，因此就当时说，有些人实在难免会有点儿失望，因为对五四的期望太高了。

这实在应该是两回事，是全然不相干的事儿。

在当时想不通，在今天就很清楚了。

时间教会了一些人。实在的，今年南大第一届毕业生，有好多在近年都已经快要告老退休了。

论时光，那已经在社会上工作、服务满30年了。

除了做为教授，上课教学之外，一般人知道凌教授同时也是一名作家。

凌教授到南大来的第二年曾经开了一个画展，卖了一些钱。

许多人知道凌教授开画展，可能有人不知道凌教授开画展筹到的钱，原本是要成立一个社，购买一些较难买到的文艺书，同时准备出版一本刊物。

后来，书是从国外买回来了不少，在那时实在有好多是难得一见的好书；

社也组织了起来，由当时在报刊之上撰写“大学生活

”的汀上白、汀上红（肖子云）、还有符剑、而已等，我自己也参加了，社名叫“创作社”，以示与“创造社”有别。

在凌教授的鼓励之下，没有采用定期出版刊物的形式，那大概因为当时准证难申请，只采用“丛刊”的形式。

《夏天的街》出版后，颇引起注意，也有多少的波动；跟着《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》也出版了。记得当时这本丛书还印了二版。这也是少见的。

随着就筹备出版第三本——《马华文学的独特性》，可是第一届的我们都要走了，都要到社会上去谋生、去碰社会的壁了。

雷贤秀、李月妹、李大倍、林北、孟毅、林木海、杰伦、陈如信等大概八九位第二、三、四届的同学来接手。

当时，有些人以为“创作社”一定有很多钱，有凌教授的支持，有前2本销数不错的丛书，肯定会有很多钱。

后来才知道，凌教授最后并没有给予经济支持，只是给予精神的鼓励。“创作社”只有六个成员，每个人出资50元，共300元而已。同时，书虽然销得不错，可是收回的款项并不太多。这情况，当时不只自己不懂，我想年轻的那些朋友也不清楚，但是，今天了解寄售书的情况的人，就知之甚稔了。

对于“创作社”，凌教授虽没直接参预，但是还是从旁支持，担任顾问。记得当时，连士升先生在《南洋商报》的“海滨寄简”是很有影响力，很受读者欢迎的。这几

本书的出版，居然蒙连先生在“寄简”中提出专论，这当然是因凌教授的关系了。

在南洋大学几年，凌教授写的文章虽然不多，但是就记忆所记：有《新诗的未来》、《爱山芦梦影》。

《新诗的未来》对新诗作了深入的剖析。

《爱山芦梦影》后来似乎出了专书；香港的一个选集中也选载了这篇文章。

这一点，应该是凌老师到南洋以后播下的种子。

1960年，凌老师要走了，她要回伦敦去了。

当时，我们可能还在找工作，还在蒙难，也可能有的已经教书了，或有的做别的工作。

记得当天黄昏，我们跟凌老师吃了南洋风味以后，在红灯码头送凌老师上船。她当时之所以选择乘船主要是有一次她搭外国的班机，颇受机上空姐的白眼。那时，亚洲人还是受白种人的歧视的。

当时，凌老师送我们每人一个鳄鱼皮的皮包，到今天我还珍藏着。

那天，记得凌老师很是依依，临走还要再喝一次咖啡。

我们也以为从此没有机会再见到凌老师了。

那知道，1976年我到欧洲开会，我去拜会了凌老师。

1982年，我跟在伦敦的一位黄同学驱车到西区去拜会凌老师。

那天，敲了好长一阵门，她才来开门，只见她背已弯曲，已经是龙钟老态了。

当时，嘴里不说，心里很是难过。一个老人，一只小猫，一座大而空的屋子。离开时，望着那扇门，心里有一阵凄恻。

那天，再见到那本书，她那身影还是不断在脑际里浮现着。

《联合早报文艺城》
1990年6月21日